

修古堂文稿

張元濟

與

吳興徐仲

方氏著

上海圖書館 編

序

中華古籍保護研究

重刻朱子近思錄序

館課

近思之學昉自子夏朱子於寒泉精舍葺四子之

書取其

者之道

命名之

則天下

累郭氏世大人閣下久遠唯

起居身痛為歎昨奉月二十日

年結藉坐身痛未刻去秋行在民信而解殘

年已付劫友亦未入銀外三三其考全後發

出字在書布謝款

全見日候

張元

覆載

月



# 張元濟與

## 中華古籍保護研究

上海圖書館  
編

修古堂文稿

序

重刻朱子近思錄序

近思之學昉自子夏朱子於寒泉精舍葺四子之書取其要且約者而名之曰近思錄凡所以示學者之道朱子之序已言其梗槩愚惟是反覆深思命名之意爲之掩卷歎曰近思之義大矣哉夫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325-8772-8

I. ①张… II. ①上… III. ①张元济(1867-1959)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291 号

## 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上海图书馆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306,000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8772-8

K·2455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目 录

## 一、古籍整理

- 影印《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前言 陈先行 / 3
- 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 沈 津 / 19
- 张元济与《国藏善本丛刊》 周 武 / 53
- 《百衲本二十四史》：现代古籍整理的典范 柳和城 / 86
- 张元济与《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李志茗 / 108
- 张元济所编《四部丛刊》各子目版本补配概览 曹海花 / 120
- 涵芬楼旧藏沈岩《庄子》校本与《四部丛刊》所附  
《庄子札记》 冯 坤 / 133
- 《四部丛刊·史通》底本再考 曹 鑫 / 141
- 《四部丛刊》溯源：上海图书馆藏《四部举要说略》  
简释 邓 昉 / 156
- 其善有七 异曲同工
- 读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与陈垣
- 《景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缘起》有感 李国庆 / 173
- 《丛书集成初编》漫议 王国良 / 185
-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见与张元济先生相关的两纸  
书籍夹片兼述所见古籍夹片 卢雪燕 / 197

## 二、尺牍

-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述论 胡 坚 / 209
- 上海图书馆藏陈三立致张元济函札三通简释 吴建伟 / 226
- 张元济致潘景郑信札释读 陈 雷 / 235

- 丁文江藏札中与商务印书馆交往之点滴 沈从文 / 244  
夏曾佑与严译名著出版之关系  
——以张元济、严复致夏曾佑信札为中心 栾伟平 / 255

### 三、地方文献

- 张元济委托黄炎培查检满铁大连图书馆地方志始末 陈 颖 / 273  
张元济对续辑《携李文系》的贡献 沈秋燕 / 287

### 四、访书

- 张元济与汉文西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邹振环 / 299  
1928 年秋张元济日本访书考 陈东辉 / 318  
“斯文未绝，吾道不孤”  
——丽宋楼藏书东渡前后张元济先生诸事 丁唯涵 / 329

### 五、人物

- 古籍保护整理出版事业中的一对忘年交  
——纪念张元济与郑振铎 陈福康 / 343  
张元济与瞿启甲的友情及书事交往 曹培根 / 362

### 六、图书馆

- 张元济与国家图书馆早期古籍收藏 刘 洁 / 375  
试论张元济在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 路泽武 / 388

---

## 一、古籍整理

---



## 影印《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前言

上海图书馆 陈先行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连同存藏大批古籍善本的涵芬楼，尽毁于日寇侵略战火之中，积蓄二十多年的近五十万册图书顷刻之间化为灰烬。这场近代藏书史上骇人听闻的浩劫，犹如刀绞吾国人心，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不幸之中尚感万幸的是，由于张菊生元济先生的远见卓识，于兵燹早有防范之心，先事将涵芬楼中最可珍贵之善本移存上海金城银行保管库，方使其免遭灭顶之灾。《涵芬楼烬余书录》（以下简称《涵录》），就是张菊老于事变之后经年编撰，介绍该批幸存善本的一部版本目录力作，于195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菊老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先生后序称，发表《涵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距离“一·二八事变”八十五年后的今天，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这部过往鲜为人所关注的《涵录》稿本，固然出于对商务印书馆创办一百二十周年、张菊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纪念，亦是以告诫世人铭记历史为首要出发点。而藉此机会对《涵录》及其版本所展开的讨论，则攸关版本学的传承、发展以及古籍保护，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一、“烬余书”反映张元济的“善本”观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专藏古籍善本之处。据《涵录》排印本所附《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之著录,以及张菊老自序所称该目录漏略“犹千有七百余种”推算,楼中原藏善本至少有三四千部(尚不包括大批地方志),皆由菊老耗心费力访得,大多出自会稽徐氏镕经铸史斋、北京清室宗盛氏意园、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顾氏澹闻斋、乌程蒋氏密韵楼,以及浚阳端氏、江阴缪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等清末民初著名藏书之家,可谓流传有绪,富甲东南。何为“善本”,菊老未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对入贮涵芬楼之善本,其自序概括为“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而移存金城银行之书,又系从涵芬楼所藏善本中遴选者,遴选应当有其标准,但菊老亦未曾作详细的说明,仅言“择其尤者”。何为善本之尤,我们从这批“烬余书”本身,大致能够看出端倪。《涵录》著录之善本总共 547 部,仅占涵芬楼藏书十分之一强。其中宋刻本(含元修、元明递修本)90 部,影宋抄本 22 部,金刻本 1 部,蒙古刻本 2 部,元刻本(含明修本)87 部,名家批校本 72 部,稿本 17 部,其余多为刊刻于万历前之稀见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经名家递藏之明清旧抄本<sup>①</sup>。据此可知,菊老以“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概括涵芬楼所藏之善本,其实也是他遴选移存金城银行善本之标准。换言之,“烬余书”而外,涵芬楼中的其余善本纵有这般那样的价值,多因相对逊色而未能入菊老法眼。他如遭焚毁的 2 600 余种地方志,其中明刻本逾 40 部,诸如嘉靖刻本

① 宋元本之数量,与张元济先生序文所言稍有出入。由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涵芬楼烬余书录》之著录有所改动,宋元本的实际存量与此统计亦有所出入。

《潼川州志》、《廉州府志》、《海宁县志》、《龙岩县志》，万历刻本《南皮县志》、《建阳县志》、《宝鸡县志》、《黄安初乘》等，时至今日皆已难寻踪迹；菊老自序亦谓该批地方志“其间珍贵之纪述，恐有比善本为尤重者”，但它们最终并未被纳入移存金城银行之列（其余清代以后的方志实际上连涵芬楼都未得入）<sup>①</sup>。显然，在菊老眼中，即便“善本”也有等第高下之区别，其衡量标准以历史文物价值高低为主。可以这样理解，涵芬楼中的“烬余书”属一、二等善本，其余则为普通善本。

菊老的“善本”观并非别出心裁，而是渊源有自。“善本”之名，元日之前已有，专指经过审慎校勘，文字准确无误之写本或印本<sup>②</sup>，属于校勘学范畴，重在文献价值。明代中期以降，“善本”的含义发生嬗变，即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的书本方称善本，尤其重在文物价值。发生这种变化，有其历史背景。在明代中期以前，人们从未视书籍为文物，故书籍的自然损毁普遍寻常。例如唐五代以前的写本，在今天看来件件可宝，但在宋代，雕版印刷兴盛之后，写本式微，旧写本亦不受重视，若非清季敦煌遗书的发现，原有幸保存下来的唐五代以前写本，甚至不如存世晋唐书画的数量为多。以往人们总认为天灾、人祸（即兵燹与官方禁毁）是书籍损毁的主因，殊不知无时不刻发生的自然损毁其实更加严重。迨至明代中期以后则不然。在旧写本濒临绝迹、人们早已

① 该批地方志详见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排印本《涵芬楼志书目录》（索书号 512180）、抄本《涵芬楼志书钞目（在印本目录外者）》（索书号 568315）。张元济先生未将明代稀见方志移存金城银行可能事出有因，或许想保持整批方志面貌、不令其分散也未可知。

② 如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有云：“宋次道家藏书，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蓄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又如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校官精加校勘。”再如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云：“节斋患严陵本字小且讹，于是精加讎校，易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謂为天下之善本也。”

视宋本为两宋及以前文献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宋本也成了稀有之物。几乎与官方、私家四处寻觅宋本大举翻刻同时,市场上出现作伪的宋本<sup>①</sup>,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定版本,版本学于是发端。制造假宋版的目的是为了牟利,而从其商业现象的背后,透露出当时宋版已被视为与畴昔寻常文献不可同日而语的珍贵文物,人们竞相收藏。由于存世宋版的面貌不一,价值亦各不相同,因此在鉴定版本真伪的前提下,评估宋版乃至其他版本的文物价值也随之成为热门<sup>②</sup>。自是以后,书籍便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的双重属性,“物以稀为贵”不再只是古董家的理念,也成为藏书家们的共识。随着版本学的发展,不特宋元旧本,未刊或已刊稿本(稿本在明代中期以前与宋元本一样未被刻意收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稿本,几乎都是明季以后产生与保存者便是明证)、未刊或绵延古本一线之传的明清抄本、清代名家的批校本等,凡属独一无二或

① 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云:“近时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围,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瞞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曰:“凡书之值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抄、刻,抄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值之等定矣。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以此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其印、其装为差。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版磨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值倍于全者,有模糊磨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者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

流传稀见之本，皆相继被人们奉为善本而受到呵护珍藏，“善本”遂成为版本学的专门名词，并于清初催生出第一部私家善本目录《读书敏求记》。到了清乾隆时代，更出现了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除较以往更精于鉴定考订版本者外，其所著录之内殿皮藏宋元明本，每册前后皆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二玺，以示珍贵；不仅如此，还用不同材质的函套装潢，以区别宋金版及影宋钞、元版、明版之不同等第<sup>①</sup>。这充分说明，生发于民间的版本学以及新的“善本”观，已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行。其影响所及，不仅使公私藏书目录著录版本形成风气，而且因前所未有地崇尚善本，致使后来的公私版本目录多为善本目录。此种现象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们对书籍价值再认识的结果。可以说，我国古籍尤其是善本，长期以来受到由民间至官方的高度重视与保护，是从人们普遍认识到书籍具有文物属性、进而改变“善本”观才真正开始的。

由此可见，菊老的“善本”观，与明末清初以来的版本学家们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总体而言，“烬余书”客观反映了将文物价值放在首位的择善标准，其能够幸存，洵非偶然。由于协助菊老整理《涵录》的顾廷龙先生后来执掌上海图书馆，这种“善本”观也在上图得到了传承与体现。上图是最早将馆藏善本定为不同等级的公共图书馆，其择善本之尤者分别定为一级、二级藏品，其余为普通善本，与菊老选择涵芬楼善本移存金城银行的标准基本相符。

《涵录》发表后越二十六年，政府发起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目》），有学者试图对“善本”做出貌似全面的解读，提出所谓“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与艺术代表性，“三性”并重，只要符合其中一、二性者便可称为善本。在当时形势下，虽无人公

① 《天禄琳琅书目·凡例》有云：“其宋、金版及影宋钞，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绫，明版以褐色绫，用示差等。”

开对“三性”提出不同意见,但《善目》编委会为便实际操作,制定了收录《善目》的九条标准<sup>①</sup>。明眼人不难看出,该九条标准的要旨依然是以稀为贵,以少称善。纵使强调学术资料性、青睐艺术代表性,只要流传多,便不能入《善目》。即如被张之洞盛称、《书目答问》为学子所开列的乾嘉汉学家们的精校精注刻本,若无名家手书批校题跋,《善目》是不收的。因此,不论有意无意,“九条”与“三性”相抵牾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有史以来,人们从未忽略过书籍的文献价值(包括所谓的学术性与艺术性),版本学家们甚至比别人更为重视,但若选善本,主要遵循历史文物性,其他两性则是附庸。这样做符合“物以稀为贵”的规律,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改变不了。

## 二、以版本学发展的眼光看待《涵录》

《涵录》是一部藏书志体式的版本目录。欲评价《涵录》,首先

---

① 据 1977 至 1978 年间颁行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其九条收录标准为:

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但版本模糊而流传尚多者不收。

三、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七、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九、明代印谱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铃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对藏书志性质要有清楚的认识。以往有些治目录学者,每将《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以及《涵录》等藏书志体式的版本目录,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提要目录混为一谈,以为彼此都旨在宣介藏书,从目录形式上看,两者皆有解题;从解题涉及内容上看,也不无相同之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版本目录是明代中后期版本学问世以后的产物,版本学既以鉴定版本发端,作为版本目录的藏书志,自然具有鲜明的版本学特征,那就是鉴定版本真伪,区分版本源流与辨别版本优劣。这是藏书志与其他提要目录最根本的区别。而古籍目录真要达到章学诚所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地,除对古籍予以合理的类分、撰写提要以阐述其学术源流之外,还应对版本予以准确的鉴定著录。如果版本的来龙去脉未明,文本的面貌不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从何谈起。因此,重在鉴定考订版本,是藏书志区别于其他提要目录的标志,亦是衡量一部藏书志质量高低的重要依据。

对《涵录》鉴定考订版本之成就,在许多研究者的著述中已有颇为详尽的介绍,无需赘言。但如果以版本学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涵录》,人们不禁会思考,相较《涵录》,当今之版本学,哪些尚且不如,哪些需要在其成就基础上更上层楼。

《涵录》于鉴定版本有其鲜明特点,兹举数端:

(一) 前人鉴定版本、考订版本源流,多注重“刻”,即该刻本是其书的原刻抑或翻刻。而《涵录》不仅重视“刻”,亦重视“本”,即这部涵芬楼藏本是该刻的初印本抑或后印本。若属后印且有补版,则进而辨别孰为原版,孰系补版。如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存二十八卷,即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又称黄唐本),《涵录》区分原版与补版的不同形制,详列其各自刻工,辨析甚明。又如宋庆元刻本《春秋左传正义》,《涵录》指出刻工姓名与黄唐本《礼记正义》大都相同,而亦分两类:凡版心不记字数、有宋瑜等刻工名者,皆为原版;

版心兼记字数、有郑堃等刻工名者，皆系补版，并特别强调，补版也非同出一时。从只注重“刻”到亦注重“本”，是版本学的进步。因为古籍的传播与利用，所凭藉依附的往往是某一具体的“本”，且不论宋元孤本，研究利用者只能惟其本是据，即使某“刻”存多部印本，各印本的面貌也未必皆同，若率尔将某一印本指代某刻，恐有盲人摸象之虞，故弄清“本”的面貌很重要。《涵录》辨识“本”之精到如此，不特前贤少有，即便后出之《中国版刻图录》、《善目》也有所不及。如旧藏吴县潘氏滂喜斋、今藏上海图书馆之宋江西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避讳至“构”字；原版单鱼尾，补版则以双鱼尾居多，且版心上下或镌有字数，与原版字体也有差异。原版刻工有高智广、高智平、蔡侃、周彦、龚授、余山、彭师文、刘浩、刘正、虞仲、吴士明、蔡昭、黄明、杨才、刘仁等，其中高智广、高智平、蔡侃又参与刊刻绍兴二十二年（1152）抚州本《谢幼槃集》；补版刻工有余安、高安国、高安道、高安平、高文显、周昂、李皋等，其中余安、高安国、高安道、高文显于淳熙间（1174—1189）为抚州公使库雕刻《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书。据此，知该本雕版于绍兴后期，修版于淳熙间，雕、修版皆在抚州。而《中国版刻图录》于此并未能做出明确揭示；《善目》仅著录为“宋绍兴刻本”，也未注意修补版面貌。类此鉴定著录版本有缺陷者，今人须循《涵录》之道逐一加以弥补。

（二）《涵录》注重根据各时代、各地区版刻字体风格鉴定版本。如宋刻本《六臣注文选》解题有云：“是本无版刻时地，审其字体，当为建阳刊刻；避宁宗讳，则必在庆元以后也。”又如明覆元刻本《礼经会元》解题云：“余尝见元本，版式行款悉同，是本无覆刻序跋可考，审其槧法，当在有明正嘉之间。”再如明如隐堂刻本《洛阳伽蓝记》解题云：“察其版刻，当在明代嘉隆之际。”这种鉴定方法旧时称为“观风望气”，端由长期鉴定版本实践中积累经验而得。出

于各种原因,许多存世古籍版本无刊记、序跋等刻书依据,其刊刻时地,每赖“观风望气”作出判断,此乃版本学家鉴定实力之体现,非纸上谈兵者所能措手。孰料后来在编纂《善目》之时,“观风望气”遭受莫名其妙的批判,认为其缺乏科学依据。由于《善目》是汇集各地相关人员共同编纂,水平既参差不齐,版本学理念亦各不相同。前辈专家为顾全大局,不得不采取某种程度的忍让与妥协。于是,有些明明可以凭“观风望气”定夺的版刻,如嘉靖、万历刻本,《善目》只能一律著录为“明刻本”(若按照批判者的“理论”,即使定为明刻本,似乎也无“科学依据”)。而《善目》施行的编排规则,凡有确切刊刻年代者排在前,否则列于后。于是出现嘉靖本置于万历本之后的荒谬情况。如上海图书馆藏清莫友芝跋明刻本《吴越春秋》十卷,视其字体风格,《善目》主事者不可能不辨其雕刻于嘉靖时代,但出于无奈,只能置之于万历十四年冯氏卧龙山房刻本之后。《善目》诸如此类的错误不少,亟待一批像菊老那样具有“观风望气”本领者进行纠正。

(三)《涵录》于稿抄本鉴定考订甚精,此又为菊老治版本学的一大亮点。如傅增湘校抄本《巴西文集》,傅氏未曾注意该抄本有作伪嫌疑,今人或有识其非鲍氏知不足斋抄本而自诩为新发现者,不知菊老早已指出“卷末鲍以文跋及知不足斋藏印均伪造”。令人殊感遗憾的是,《涵录》有些鉴定成果未能在《善目》中得到反映。如王引之稿本《周秦名字解故》,《涵录》解题曰:“是书已先刊成,引之复取刊本重加修订,满纸涂乙,无异初稿。”而《善目》则著录为“清嘉庆刻本,清王引之订补”。按书稿之形成,有初稿、修改稿、定稿三类,已刊印者未必是最终定稿,这在古籍中并不少见。而王引之适有一习惯,为方便征求意见,每将初稿先行付梓分送师友,俟汇聚各家意见之后,在刻本上再事修改,《周秦名字解故》如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经义述闻》稿本亦如是。因此,凡作者修改自己的



著作,无论修改于写本或印本,都应视为修改稿本。就揭示版本性质特点而言,当以《涵录》为胜。又如明影宋抄本《麟台故事》残存三卷,有明钱穀题记、清黄丕烈题跋,《善目》著录为“明抄本”,不以“影宋抄”为然。按此为今存宋本系统最早传本,与武英殿聚珍版辑佚《永乐大典》五卷本系统颇相出入,黄氏考之稍简,菊老辨之为详。黄氏与菊老皆定此为影宋抄本,自有道理。盖影抄本之出现,与明正嘉间仿宋刻本同时,虽早期影抄本或不若后来毛氏汲古阁影抄本那么讲究(如不影抄版格、刻工,抄写或不似毛抄精美),但如果以为影抄本自汲古阁毛氏始,或只有毛抄才能算影抄本,显然缺乏认知,因为在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就已特意著录自家抄本之前的影抄本,以示与其他抄本之区别。故《善目》之版本著录将“影宋”两字删去,有欠妥当。再如清袁氏五砚楼旧藏抄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经袁廷桢、顾广圻、黄丕烈、李富孙、汪士钟等校勘题跋,《涵录》通过考订,指出此乃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氏艺芸书舍刊刻该书之底本。而《善目》既忽略之,又因不当之编排体例(刻本在前,抄本列后),将此抄本置于汪氏刻本之后,版本源流尽失矣。

诚然,《涵录》于鉴定版本也有未到之处。譬如将怡府旧藏之《新编方輿胜览》定为宋本,其实为元翻本;将两部《大广益会玉篇》皆定为元延祐刻本,实际前一部刻于明初,后一部刊刻更晚,等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及《善目》,对《涵录》有关版本著录曾作过改正,但也有失辨者,如对前一部《大广益会玉篇》仍著录为元刻本。所有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造成。其一,囿于客观条件,无法作相关版本比对。不仅《涵录》,前人编制古籍版本目录,往往只能以自己的藏书与别家的目录(包括藏书志、题跋记)进行校核,而无法将包括别家在内原书版本作同案比对,甚至连别家的书影都难以见到,这种状况直至编纂《善目》也未获根本改变,故前